

革命·宪政·调和

——章士钊报刊言论研究

张 谦 著

河南人民出版社

清末民初政变与报刊舆论
主张《苏报》鼓吹革命挂帅
流亡海外 倡言政党政治
坚持独立 追求共和政体
回归传统 意在调和
章士钊报刊言论思想演变之理路



革命 · 宪政 · 调和

——章士钊报刊言论研究

张 谦 著

河 南 人 民 出 版 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革命·宪政·调和——章士钊报刊言论研究/张谦著.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09.3
ISBN 978-7-215-06828-5

I. 革… II. 张… III. 章士钊(1881~1973)—政治思想—研究 IV. D092.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43978 号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电话:65788036)

新华书店经销 郑州文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张 6.5

字数 152 千字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6.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清末民初政象与报刊舆论·····	1
一、立宪思潮与预备立宪的兴起·····	1
二、革命浪潮的高涨·····	7
三、文人论政大行其道·····	9
四、章士钊报刊生涯及相关研究综述·····	13
第二章 主笔《苏报》鼓吹革命排满·····	20
一、早年经历·····	21
1. 学堂闹学·····	21
2. 罢学革命·····	25
二、宪政思想的萌芽·····	32
1. 倡言革命·····	32
2. 鼓吹排满·····	39
三、早年报刊言论之特点与核心·····	42
第三章 流亡海外 倡言政党政治·····	50
一、政党言论的出现·····	50
二、从万案到留学英伦:言论重心改弦更张·····	53

三、政党政治言论的提出·····	59
四、政党与政党内阁·····	63
五、党争与党德·····	72
六、“毁党造党”：政党政治言论之终结·····	76
七、政党政治言论之评析·····	80
 第四章 坚持独立 追求共和政体 ·····	86
一、政制之争·····	87
1. 共和之精神·····	87
2. 内阁制之运作·····	92
二、代议机构之批判·····	107
1. 民初参议院之定位·····	107
2. 参议院之权力·····	111
3. 一院制主张·····	117
三、临时约法之评论·····	122
1. 立宪之精髓·····	122
2. 临时约法之评论·····	125
3. 民国宪法之前途·····	131
四、变更政制之商榷·····	136
1. 内阁制难成·····	136
2. 内阁制与总统制之比较·····	140
 第五章 回归传统 意在调和 ·····	146
一、调和立国论·····	146
二、联邦制·····	157
三、以农立国论·····	160

第六章 章士钊报刊言论思想演变之理路·····	168
一、政情与章氏报刊言论思想之取舍·····	168
二、西方政治思想对章氏言论的影响·····	174
三、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章氏报刊言论思想的归宿·····	179
四、几点启示·····	184
参考书目·····	190

第一章 清末民初政象与报刊舆论

“三年之内，满清必亡”^①。这是章士钊于1903年的预言，抑或看做他对时局的基本判断，并反映出他当时的政治主张。此时，章士钊是个20出头的年轻人，而满清朝廷确已呈腐朽衰弱之象。

一、立宪思潮与预备立宪的兴起

在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尽管“挑战—反应”与“传统—现代”等立足中西冲突，勾画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基本线索的研究模式日益受到挑战^②，但晚清以来，特别是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内部的变动就与外来的影响，每每有关。一个不容否定的事实是：每一次中国与外国在政治事务上的接触、冲突和交涉，都必然地刺激着中国内部产生政治和社会思潮上的剧变。此从有清一代以来，最为明显。对于一个落后贫弱的国家来说，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依此来看清末体制内的改革，亦是如此。正如日本学者市古宙三讨论1901年以后清政府在政治和制度上所作的改革时指出：在清末的改

① 章士钊：《汉奸辩》，《黄帝魂》，见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A8），台湾国民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68年9月，第51页。

② 关于这些研究模式的讨论，参见[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7月。

革方案中存在很多自取失败的矛盾。^①这是一条不归之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反映近代中国走在这条不归路上有三组重要的历史表征,并且均是首先与外部有关的事件:1894~1895年中日战争——戊戌维新、1900~1901年庚子之变——清末新政、1904~1905年日俄战争——预备立宪。

戊戌变法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最初尝试。这次变法虽是知识分子推动上层人物实行的变革,但由于当时帝党与后党的存在,变法执行者并非真正的掌权派,所以对政治体制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变动。变法虽然没有也不可能成功,但作为清末政治体制内改革的参照系已经在社会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民穷国弱的现实,使得贤人志士为追求国家自强自富,摆脱弱国之耻,知难而进,努力探索变革国家的政治体制。满清政权体制内、外的变革双双而至,无可避让。庚子之变,真正的当权者一度流离失所,其中苦感甚多,非常人所能有。为国内外形势所迫,他们终于产生了主动变革的意图,并希望通过实施渐进的改革来维持衰落的王朝。日俄战争更加刺激了王朝主宰者的变革之心。中俄两个泱泱大国惨败于蕞尔小国,给朝野上下的震惊是难以想象的。失败是耻辱,正是这耻辱打破了中国人传统上安于现状的封闭心理。人们都思考着同样一个问题:中国何以弱,西方何以强?为什么日本能跻身于强国之列?在学习西方与学习日本学习西方的过程中,人们对器物之变、制度之变的认识,渐从模糊到清晰。日本的明治维新,即君主立宪政治,成为中国人追求自强的样本。

君主立宪是日本学习西方的结果,而西方代议政治是资产阶级反对君主专制斗争的产物,是西方国家政治在其自身特定的历史条

① [美]费正清、刘广京编,社科院历史所编译室译:《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下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2月,第473页。

件下自然发展的结果。在近代中西接触中,中国传统的政治模式对外不能成功应付外来入侵,对内不能维持国家稳定,救亡图存成为近代中国的关键所在。在探求中国存与兴的道路上,模仿西方是显而易见的。在“中学”与“西学”、“体”与“用”的长期争论中,在对西方了解不断加深的过程中,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西方的议会制度逐渐产生好感。

早期知识分子在将西方议会制度与中国传统君主制度进行比较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它是优于中国传统君主制度的强国之策。道光咸丰年间的中国人没有在鸦片战争之后就开始维新,他们将战争的失败归因于“奸臣误国”。虽然至咸丰末年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城后,少数觉悟者知道了学习西洋的必要性,但“中华民族丧失了二十年的宝贵光阴”^①。此后,魏源、徐继畲、王韬、郑观应等人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认知程度不断加深,至甲午战前,陈炽、何启、胡礼垣、张荫桓等人已明显有提倡西方政治制度的倾向。他们中间更有人明确提出中国应该实行君主立宪制度^②。诗人黄遵宪 1890 年至 1891 年在英期间,对英国的代议制度也很感兴趣,认为中国第一宜设议院,“上自朝廷,下至府县,咸设民选议院,为出治之所”。第二宜改革行政系统,“将二十一行省划五大部,各设总督,其体制如澳洲、加拿大

① 蒋廷黻著:《中国近代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 年 12 月,第 16~18 页。这少数觉悟者包括林则徐、魏源等人。

② 熊月之认为,“崔国因是近代中国向朝廷明确提出开设议院要求的第一人”。他在 1883 年《奏为国体不立后患方深请鉴前车速筹布置恭折》中称:“设议院者,所以因势利导,而为自强之关键也。”崔国因:《臬实子存稿》,光绪年间刻本,第 23 页。郑观应则是“中国近代明确提出实行君主立宪要求的第一人”。其《论议政》中写道:“所冀中国,上效三代之遗风,下仿泰西之良法,体察民情,博采众议,务使上下无扞格之虞,臣民泯异同之见,则长治久安之道,有可豫期者矣。”郑观应:《易言》上卷,第 45 页。参见熊月之著:《中国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 年 6 月,第 129~130 页、第 141~143 页。

总督……”“必以英吉利为师”^①。20世纪以前的知识分子大多意识到西方议会制度优于中国政治制度,大谈内忧外患之时君主立宪制在中国的迫切与必要,但在制度运作上的认识还是相当浅薄的。

1900年至1901年的庚子之变使得当朝者一度仓皇出逃,“新政”之意由此而发。1904年至1905年,日俄战争使满清朝野更为震惊,他们认为日本战胜俄国就是立宪政治对专制政治的胜利,不少地方大员如两广总督岑春煊、两江总督魏光燾、湖广总督端方、云南巡抚林绍年要求朝廷仿效日本实行立宪政体,直隶总督袁世凯、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甚至联名上奏,明确提出“自今十二年以后实行立宪政体”^②。政府又派载泽、端方等五大臣出洋考察外国政治,将立宪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确定下来。1906年9月1日,慈禧太后召集大臣会议,下诏宣布“预备立宪”,承认“各国之所以富强者,实由于实行宪法,取决公论”,而中国“政令积久相仍,日处阡危,受患迫切”,“非广求知识,更订法制不可”^③。此后,实行中央与地方官制改革。1908年8月,效仿日本宪法的《钦定宪法大纲》颁布,规定:“谨按君主立宪政体,居上有统治国家之大权,凡立法、行政、司法,皆归总揽,而以议院协赞立法,以政府辅弼行政,以法院遵律司法。上有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踰越。”^④

① 《东海公来简》、《水苍雁红馆主来简》,见《新民丛报》,第23、24号,1903年1月12、27日。转引自张朋园著:《黄遵宪的政治思想及其对梁启超的影响》,见《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期),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9年8月,第220页。

② 《时报》,1905年7月2日。

③ 朱寿朋编,张静庐校:《光绪朝东华录》(第5册),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563页。

④ 《宪政编查馆资政院会奏宪法大纲暨议院法选举法要领及逐年筹备事宜折》(光绪三十四年八月初一),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7月,第57页。

朝廷内部对立宪的准备以及一些督抚大员们的赞同,使得在野的知识分子极为活跃。既然立宪的优越之处是上下相通,作为社会精英的知识分子当然也就有了参政的希望,所以他们真心实意地鼓吹立宪,以图实现参政的目的。清廷颁布预备立宪旨后,立宪思潮高涨,立宪团体也由此出现,并开展起有组织的立宪活动^①。这些团体包括郑孝胥、张謇等人于1906年12月16日在上海组织的预备立宪公会,梁启超于1907年10月17日在东京成立的政闻社,杨度于1907年夏在东京组织的宪政讲习所,等等。但朝廷的官制改革与其他预备立宪措施,并未让立宪派感到满意。因为这些实际上拒绝了立宪派提前召开国会的要求。立宪派没有得到确实的参政利益,所以争取建立代议机构成为立宪派运动的核心问题。

正由于朝廷与立宪派在立宪问题上存在不可克服的矛盾,后者便开展起以促进政府召开国会为主要内容的立宪运动。张謇倡议组织了“国会请愿同志会”,以孙洪伊领衔,从1907年秋至1910年10月,展开了大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以求速开国会,建成责任内阁。1910年5月,国会请愿同志会发表意见书,痛言速开国会之必要,而且声称:“吾国若能速开国会,可革一切贫弱之根源”,“吾召集国会早一日,即早收一日之人心;迟一日,即增一日之荆棘。且即为保存君权一事起见,亦当速应人民之要求。考各国宪政演进之前史,即可知之……”^②《中国新报》第九期刊登《请开国会之理由书》一文,认为国会“内之集合国民之心理以整顿内政,外之发展国民之势力以捍御外侮,振纲纪,固国本,莫重于此”。并称国会有五大作用:第一,欲整理财政则国会不可缓;第二,欲振兴教育则国会不可缓;第

① 参见张玉法著:《清季的立宪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4月。

② 《国会请愿同志会意见书》,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3卷),北京:三联书店,1977年12月,第606~608页。

三,欲扩张军备则国会不可缓;第四,欲澄清官治则国会不可缓;第五,欲保全国权则国会不可缓。^①

同时,一些地方督抚大员也向朝廷进言建立代议机构。1907年6月10日,岑春煊上奏,拟预备立宪阶级,并建议在中央设立资政院代表上院,以都察院代表下院,并在各省设立谘议局。明确提出了筹备中央与地方代议机构的问题。7月,袁世凯上奏称:“事机危迫,请赶紧实行预备立宪,列陈十事:一昭大信(亲诣太庙,昭告立宪),二举人才,三振国势,四融满汉,五行赏罚,六明党派,七建政府(采内阁会议制度),八设资政院(州县设议事会,省设谘议局),九办地方自治,十行普及教育。”^②应该指出,岑、袁二人所倡设的资政院,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国会,而是主张“该院只有建议之权,而无强政府施行之力”^③。9月,朝廷正式下诏宣布设立资政院以立议院为基础,成为国会设立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步。1909年10月,各省谘议局开会。次年10月,第一届资政院开院。北京资政院开会和各省谘议局的成立,标志着各地已有的立宪组织有了合法的地位。朝野人士均将资政院视为议院或国会性质的国家权力机构。这对于立宪派议政参政十分有利。1911年5月,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责任内阁——“皇族内阁”成立,并颁布内阁办事暂行章程。清朝廷的这种立宪结果沉重地打击了立宪派的积极性。受骗之辱使他们倍感羞愧与愤慨,终于认清了清廷以立宪为名,加强皇权的内在动机。其中一部分人认为实行立宪,已不能再依赖政府。梁启超此时运动载涛,以图开解党禁。各省立宪派积极分子如汤化龙、谭延闿、蒲殿俊等则更积

① 《请开国会之理由书》,见前揭张树书,第127~130页。

② 郭廷以编著:《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5月,第1281页。

③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第498、499页。“资政”二字即能说明资政院的功用所在,并非能有国家议会决策之权。

极,开始着手组织政党。6月,雷奋、徐佛苏、孙洪伊等在北京成立宪友会,即“以发展民权,完成宪政为目的”^①。

二、革命浪潮的高涨

如果说朝廷与立宪派相互促进、共同进行自上而下的体制内改革,成为清末一大政潮,那么甲午战争之后开始并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则以追求体制外变革,构成清末另外一大政潮。这两大政潮又共进互动,一起演示了清末的政治动荡^②。

在立宪派大张旗鼓请愿、组党的同时,革命党人不屑于立宪的要求,而是联络组织各地新军和会党,或是起义,或是暗杀,努力尝试着推翻满清王朝的统治。特别是1908年11月,光绪和慈禧太后先后死去,推翻满清统治的武装起义数量和规模都在增加。从宣统元年至武昌起义,革命党人先后组织的有影响的起义有几次:

- (1)1908年11月,熊成基率领新军在安庆起义。
- (2)1908年12月,邹鲁领导广州保亚会起义。
- (3)1910年2月,倪映典率广州新军起义。
- (4)1910年12月至次年1月,四川广安、黔江等地会党起义。
- (5)1911年3月,黄兴领导的黄花岗起义。

革命派所组织的起义主要集中在南方,除声势广传之外,均无成功可言。

另外,各地暗杀事件也屡有发生,其中影响较大的有:

- (1)1907年6月,刘思复刺杀李准。

① 参见李新主编:《中华民国史·中华民国的创立》(下),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4月,第122~125页。

② 参见张朋园著:《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年5月;张玉法著:《清季的立宪团体》、《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年4月、1975年2月。

(2)1910年3月,汪精卫、黄复生谋炸载沣。

(3)1910年11月,邝佐治谋刺载洵。

(4)1911年4月,温生才刺杀孚琦。

(5)1911年8月,林寇慈、陈敬岳谋杀李准。

(6)1911年10月,李沛基炸死凤山。

相比而言,革命派的活动较立宪派复杂,其内部分歧不断加剧,仍处于重组之中,大大小小的革命团体纷纷涌现。1907年夏,孙中山酝酿将同盟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8月,张百祥、焦达峰、邓文辉等建立了共进会。1910年2月,陶成章、章炳麟在东京重建光复会。1911年7月,谭人凤、宋教仁在上海组织了同盟会中部总会^①。

清末政治动荡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收回利权、矿权运动助长了政潮的动荡,最为突出的当数四川保路运动。各地学潮兴起,又使舆论界、思想界活力大张。在日留学生也积极要求变革,1911年1月29日,他们在东京集会,要求清廷实行立宪。3月,留日学生发表《中国危亡警告书》,警示朝廷与国人:“迺有羽电横驰,氛雾晦蒙,俄迫伊犁,英据片马,法亦挟其偏师丑旅,偪处蒙自。举国上下,四顾战栗,皇皇然若大命之将至。呜呼,辛亥,辛亥,其吾国歟訾孰火之岁乎。”^②以上这些不是推动了朝廷的宪政步伐,就是增加了革命的火焰。伴随着推翻满清革命活动的高涨,革命派的报刊言论也从地下印行开始大规模公开传播,与同时传播的宪政思潮共同构成了时局的主要舆论。当时由邹容与章太炎著文而引发的“苏报案”即令清廷大为震怒。

^① 参见前揭李新书,第127页。

^② 全体留日学生:《中国危亡警告书》,《帝国日报》,1911年3月21日。

三、文人论政大行其道

近代以来,虽然所谓“中学”与“西学”或是“体”与“用”在近代中国政治史上各自起着作用,从来就没有令时人满意的结合,但中国政治体制上也算是一步步地渐进行。这同时也表现在知识分子们曾在各自的报刊阵地各执己见。在清末立宪与立宪派运动中,体制内和体制外政治机构和团体纷纷产生,各种报刊及其时政言论也层出不穷,这些都标志着中国人参政意识的增强和参政机会的增加,客观上反映了近代中国政治发展水平的进步。在清末改革中,“进一步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制度与法律,实行了废除科举,建立新军,起草宪法,设立资政院、谘议局等重大改革,成为中国近代化进程中重要一环,也为辛亥革命后民国时期的近代化建设打下了基础”^①。文人论政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为时人描绘出一幅令人钦赏的政治图景,激发时人踊跃投身于国家图强的变革大潮当中。

清末入衰,政治发展呈现出以上两种同时并进、相互激荡的政潮,它们共同的目标是为了实现一个强大的国家政权。在当时中国既有满族的专制统治,又有西方列强入侵的政治现状下,中国社会的变革自然而然面临着两个应该同时完成的任务。但是在具体实行何种政治道路的问题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各种政治势力在心态上的表现也不尽一致,满清新政与预备立宪为的是巩固皇权,消弭革命;立宪派为的是参政议政;革命派则以反满复汉,建立共和国为己任。^② 李剑农认为,从甲午至辛亥十七年间,中国有三大政治势力:革命派、袁世凯实力派、君宪派。三者在满清政权式微之中逐渐强

① 王晓秋、尚小明编:《戊戌维新与清末新政——晚清改革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4月,第5页。

② 殷啸虎著:《近代中国宪政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1月,第37~61页。

大,各自发挥着自己的历史角色与作用。^①这说明各种政治势力确实是在满清政权的解体过程中大显身手。日俄战后,中国出现了预备宪政的趋势,抛开统治层因素而言,这无疑是较以前历史有很大的进步。但它之所以实现不了,原因在于上述不同目的的政治力量的分野。确切地说,清末宪政的失败是由于实行者的短视与反对者的激进造成的。宪政与革命两线并行,反映了近代中国探索国家与社会变革的多重性。

美国学者艾森斯塔得认为在中国通过起义和王朝更迭所发生的调适性变迁,在近代以前没有导致国家政治秩序的基本象征和制度的根本性转型,即整体性变迁。他强调在中国地理和技术条件限制之内的这种现象是由中国社会结构的内部因素所决定的。“这些因素是:业已分化的中国政权和社会的文化性取向的主导性,儒家的社会秩序理想的支配地位,以及这些取向与统治者的政策和主要阶层的政治取向之间的关系。”“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文化性的目标取向,以两个至关重要的方式,协助维护了社会政治结构的稳定性。绝大多数人民对之的接受,构成了维护帝国统一(至少是统一理想)的牢固的、并且看起来是唯一的基础。同样重要的,是代表并维系这些价值的士人的特殊社会地位。”^②而这两种方式到了近代,在西方思潮的影响之下,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前者突出地表现为清末民初的反满排满的种族主义情绪,使满清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发生动摇。后者则特别是在科举制度废除之后,由于留洋知识分子的大量增加,传统士人中分化出一批在中西文化碰撞中产生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已由传统政治的凝聚力转而成为离心力,因而其社会地位和职能

① 李剑农著:《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7月,第102页。

② [美]S. N. 艾森斯塔得著,阎步克译:《帝国的政治体系》,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第333页。

都与以前不同。这些都标志着构成中国这个传统官僚帝国的政治文化因素发生了重大的变化,预示着将来中国的变化必将是结构性的重建。

清末科举制废除,留学海外的知识分子增加,尤其是留日学生数量最多。他们开始接触西方的政治学说与文化,西方宪政思想这时也为更多的急于寻求中国政治出路的年青人所吸取,而清末立宪与立宪运动的现实同时又为他们提供了发表见解的时机与条件。可以说,宪政思想是“西学”与“中学”、“体”与“用”的争论在新旧世纪之交中国政治思潮中的主流,是新世纪的实践目标。当时宪政思想主要关注点虽在议会或国会等问题上,但几乎都在强调中国应该实行国会制度,或是强调中国实行国会制度的优越性或原因。这样的言论在当时可谓不胜枚举,而如何具体操作国会或议会制度,几乎无人问津。章士钊却是清末民初最早为中国政治设计了完整的宪政代议制的知识分子。这反映他在清末的政党政治论和民初内阁制主张中。他对国人全面系统地介绍了英国的政党政治,并提出中国应该如何实行政党内阁制。他希望将西方国家的宪政思想运用于中国政治,从而形成一个强有力且有效的政府,以此摆脱当时弱国的地位。史学界对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中来自日本、美国的政治思想资源相当重视,而对直接来自英国的政治思想的研究稍逊一些。尽管英国式的保守主义政治思想在近代中国政治思想中不是主流,但它毕竟也是中国政治资源中的一个来源,它从一个侧面反映着近代中国政治发展的复杂性。而章士钊就是受英国保守主义政治思潮影响较深的典型代表之一,这在清末民初他的政治思想演变中有着充分体现。他的政治言论和主张在当时的政坛中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历史进程是由多种方向作用力相互结合后的合力所决定的。任何处于一个作用力方向的政治因素都难以预料其自身发展的轨迹。